



憤世嫉俗

杨德昌 | 和他的电影

黃文杰◎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憤世嫉俗

杨德昌和他的电影

黃文杰◎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黄文杰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1
(卿云馆)
ISBN 978-7-309-12638-9

I. 愤… II. 黄… III. 杨德昌(1947—2007)-电影评论 IV.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480 号

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

黄文杰 著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50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638-9/J · 317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 论 / 1

- 一、 杨德昌的重要性 / 3
- 二、 既往的解读与缺失 / 8
- 三、 重读的理路与意义 / 15

第一章 格格不入：生命史 / 23

- 一、 外省人：从大陆到台湾 / 26
- 二、 异乡人：从台湾到美国 / 47
- 三、 挑战者：投身新电影运动 / 52
- 四、 独立者：新电影运动之后 / 62

第二章 现代性批判：创作核心 / 83

- 一、 批判：杨德昌的创作理念 / 86
- 二、 现代性：杨德昌的批判对象 / 93
- 三、 杨德昌批判思想的三大源泉 / 99

第三章 空洞的人：精神批判 / 115

- 一、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 117
- 二、空虚：意义沦丧及其后果 / 120
- 三、孤独：人际疏离及其后果 / 139
- 四、精神危机与战后台湾现代转型 / 151

第四章 堕落的人：道德批判 / 165

- 一、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 / 167
- 二、底线伦理崩溃与信任重建 / 170
- 三、善恶转变与辩证的人性观 / 191
- 四、道德危机与战后台湾经济发展 / 196

第五章 “毁人”：教育批判 / 209

- 一、现代教育的规训性 / 211
- 二、杨德昌与教育体制的冲突 / 214
- 三、残缺家庭与粗暴型教育 / 217

四、 专制学校与压迫式教育 / 231

五、 同流社会与功利性教育 / 241

第六章 “骗人”：媒介批判 / 253

一、 现代媒介的双重性 / 255

二、 杨德昌与媒体的冲突 / 258

三、 逐臭与拜金的媒体人 / 263

四、 小说与戏剧的欺骗性 / 266

五、 摄影的灵光效应 / 273

六、 电话的操纵特质 / 283

七、 幻象：电影与电视 / 287

第七章 “杀人”：暴力批判 / 301

一、 现代都市的危险性 / 303

二、 无常之城与失范型自杀 / 306

三、 无情之城与受挫型杀人 / 317

四、无主之城与青少年犯罪 / 330

结语 / 343

- 一、重申独立的意涵 / 345
- 二、杨德昌的独特性 / 348
- 三、杨德昌的批判实质 / 354
- 四、悲剧性的乐观主义 / 356

参考文献 / 365

附录一 杨德昌生平年表 / 377

附录二 杨德昌作品年表 / 387

后记 / 393

导论

如果抛开地域因素不谈，杨德昌可以说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

——让·米歇尔·付东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多少正视的勇气。

——鲁迅，《论睁了眼看》

一、杨德昌的重要性

杨德昌(1947—2007)是我国台湾著名电影导演，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之一。他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只完成了八部(严格地说，是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作品，分别是《指望》(1982，短片)^①、《海滩的一天》(1983)、《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独立时代》(1994)、《麻将》(1996)和《一一》(2000)。虽然作品不多，但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惊人，部部都是制作严谨、表达犀利深刻、足以载入史册的现实主义力作，这种认真而审慎的创作态度、始终维持高水准的创作品质，在华语电影圈极为罕见。

对于杨德昌的成就与地位，电影业界和学界早已达成了共识。如杨德昌的生前好友，我国台湾著名电影学者、监制，也是台湾新电影的重要舆论推手焦雄屏曾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像他这样具有高度知性、理性思考、纤细的艺术敏感度和超越性思维的作者。”“他的世界观和哲学思维的高度目前为止是华人圈无人能抵达的。”^②“他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让他成为 21 世纪世界电影的先锋，(他)是世界电影殿堂级人物。”^③台湾另一位电影学者吴珮慈也由衷赞佩：“杨德昌是一位没有任何语词、任何方式能够完整定义或描摹的电影大师。他是最后的理性思辨家与电影风格家，拥有我们心目中一个无可取代的、最珍贵的

位置。”^④

在国外，杨德昌同样获得了同行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如法国电影学者、《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认为：“如果抛开地域因素不谈，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⑤法国影评人、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评价说：“杨德昌永远都是现代中国伟大的导演，也永远都是解析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演进的最好分析家之一。”^⑥美国影评人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则在著作中肯定：“不论以何种标准来看，杨德昌都算得上是电影大师——一位电影诗人。”^⑦

即便一个此前从未接触过杨德昌电影的人，根据上述评语中的“伟大”、“大师”、“殿堂级人物”等溢美之词也不难判断，杨德昌绝非泛泛之辈，而是成就不同凡响的卓尔不群的电影作者。事实上类似的专业评价不胜枚举，更不用说大量民间影评人和无数普通影迷对杨德昌的推崇乃至膜拜。关于杨德昌的重要性，这一点实在毋庸多言。

当本人动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杨德昌导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七年了^⑧，笔者要指出的是，这七年来，杨德昌及其电影并没有因为他的逝世而变得湮没无闻，反而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2007年，他逝世的当年，10月，韩国釜山电影节举办了“杨德昌：台北的记忆”特别影展以及“杨德昌主题之夜”活动，并将亚洲电影人大奖授予杨德昌^⑨。12月，台湾电影金马奖不但在“大师回顾”单元中展映他的多部电影作品，展出他的未完成动

画遗作《追风》手稿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等文物，同时邀请多位学者和电影人举办名为“追风使命——杨德昌的光影纪事”的座谈会，更将杨德昌最后一部完成作品《一一》作为整个影展的闭幕影片，并授予其终身成就奖^⑩。2008年3月，香港国际电影节举办“一一重现：杨德昌展览”，展品包括剧本、分镜表、插画手稿、讲座、工作照、剧照、海报等，并展映了杨德昌生前的所有作品，甚至包括他早期编剧作品《1905年的冬天》（1981）^⑪、电视作品《浮萍》（1981），以及未完成的动画遗作《追风》的十一分钟片段，并且出版了纪念场刊《一一重现：杨德昌》。

事实上，在杨德昌逝世后，还有新西兰、纽约、东京、新加坡、伦敦、巴黎等地或电影节先后举办了杨德昌作品回顾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国家电影资料馆收藏了杨德昌的所有作品，也出版了让-米歇尔·付东的著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就连素来以放映环境保守著称的中国大陆，也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那就是2011年的第四届北京新人电影节，展映了杨德昌前期四部影片：《光阴的故事》（杨德昌执导了其中的一个段落《指望》）、《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

除此以外，媒体也在杨德昌去世后对其人其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报道热情。至于民间组织的纪念活动和放映活动，就更是难以计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界、媒体和影迷，对杨德昌的兴趣一直居高不下。几乎每逢杨德昌忌日或生日，总有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表相关报道，也有艺术影院和

书店举办纪念活动。比如，在杨德昌逝世五周年之际，《东方早报》、《长江商报》和凤凰网都推出了大篇幅的纪念专题报道，笔者就先后接受了后两家媒体的采访；在杨德昌逝世七周年之际，笔者又应朋友邀请，在南京先锋书店参加了题为“我想，我也老了——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七年祭”的纪念活动，担任对谈嘉宾。为了检验学界对杨德昌的关注程度，笔者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做了个调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输入题名“杨德昌”，共搜索出六十一篇文献，去掉一篇简短书讯^⑫和两篇与导演杨德昌同名人的相关文献，实际研究类文献为五十八篇，而其中杨德昌逝世后发表的文献多达四十九篇，占比近百分之八十五；在优秀硕士论文库^⑬输入题名“杨德昌”，共检索出文献十六篇，其中只有两篇是 2007 年前的论文，其余十四篇皆在 2007 年后完成。这就说明，在杨德昌逝世后，大陆学界对杨德昌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在近些年里甚至可以说是急剧提升。

就在笔者着手修改本书的时候，美国著名的标准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简称 CC）公司发行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修复版蓝光影碟。这是杨德昌的影迷翘首企盼已久的盛事。作为一部无可置疑的经典影片，《牯》片此前却从未出版过画质清晰的音像制品，除了当年的观众看过大银幕原版，一些专业人士在电影节看过修复版，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模糊不清、大量细节丢失的 LD、VCD 或者网络下载版本观看此片。虽然糟糕的画质无损该片在影迷心中的地位，但他们始终热切期盼能够一睹该片之“真容”。2016 年 3 月 22 日，对杨德昌的影迷来说，这是

一个欣喜若狂的盛大节日：CC公司的修复版蓝光影碟跳票多年后终于问世。无数人第一次真切看清了该片的原貌，许多在渣画质版本中消失于黑暗之中的道具、布景、人物面貌乃至戏剧情节，全都巨细靡遗地历历展现于观众眼前。杨德昌的影迷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兴奋刷屏，共同抒发着修复版给他们带来的惊喜、震撼与感动。就此而言，这是《牯》片的新生，是它的重新发现。在《牯》片上映十五周年之际，影迷们以高清数字媒介自觉完成了对该片的集体重看，也在这种近乎狂欢的重看仪式中，完成了对杨德昌最好的一次纪念。

由此观之，我们说杨德昌在身后声誉日隆，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在台湾岛内乃至整个华人电影圈来讲，杨德昌自然是早已成名享有盛誉，但不容否认的是，人们在不断回看与缅怀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他的价值，也给予了他越来越高的评价。我们不得不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杨德昌和他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使其在去世后获得世人持续高涨的关注热情。

笔者以为，批判性，是杨德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特质；更准确地说，杨德昌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台湾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弊病的批判，对都市环境和人性沦落的检讨，给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大陆提供的借鉴与启示，是最吸引大陆学界和影迷的因素。而伴随批判的求真质疑精神，挑战权威、敢于创新、改变社会的勇气、担当与自信，对人性良知的守卫和呼唤，对个性与自由精神的倡扬，也是直至今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仍深深地为之着迷并深切缅怀他的重要原因。认识杨德昌的批判

性，是我们认识杨德昌的起点。杨德昌的现代性批判，也是本书的阐释重点（正文将展开详述，兹不赘言）。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创作态度和精神，批判在今天的中国影坛近乎绝迹，创作者普遍如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讥刺的，缺乏正视“人生”与“社会现象”的勇气^⑩；同样遗憾的是，对杨德昌身上这个尽人皆知的特点，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出现。为此，我们不妨粗略回顾一下过往研究的大体情况。

二、既往的解读与缺失

对于杨德昌其人其作，国内外学界都有所研究，但目前既有成果整体而言比较零散，论述不够全面和彻底。海外著作目前有美国影评人约翰·安德森的 *Edward Yang* (2005, 英语)，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付东的 *Le cinéma d'Edward Yang* (2010, 法语)，以及杰米·佩纳(Jaime Pena)的 *Edward Yang* (2008, 西班牙语)。这是当前国外所能检索到的仅有的三本关于杨德昌的著作。除杰米·佩纳的著作外，另外两本都已翻译出版了中文版本，此二书都比较简单，按时间顺序逐片介绍，内容简洁。安德森偏重剧情复述，评论浅尝辄止，是面向西方世界一般影迷的入门性读物，谈不上严谨和深刻。付东则逐片分析了杨德昌影片的语言运用、叙事结构、主题表达，也涉及与西方现代主义经典电影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的著作附录了一篇与杨德昌的长篇对

谈，付东的著作附录了杨德昌本人的两篇文章，以及侯孝贤、贾樟柯、戴立忍、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皮埃尔·李斯恩特(Pierre Rissient)、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等人的纪念性文章和访谈，这些文献对杨德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他海外研究都是论文，或收于文集，或载于期刊。专门性的论文少见，多为单片评论，而且外国作者文章稀少，如 Berenice Reynaud, “Mahjong,” *Cineyama* 32 (1996): 31 – 32 等，多为华人学者(张英进、焦雄屏、叶月瑜、张建德、吕彤邻等)发表的英文文章，如 Stephen Teo(张建德), “A Brighter Summer Day: The Four-Hour Version Reviewed and Reassessed,” *Cinemaya* 14 (1992): 44 – 47。也有学者将杨德昌作为研究课题的一个部分来探讨，比较突出的有 Fredric Jameson(詹明信), “Remapping Taipei,” In Jameson,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2, 114 – 157。此文以《恐怖分子》为研究重点，辨析台湾新电影与大陆第五代的风格分野、杨德昌电影的现代主义特色、多重叙事特质，探讨后资本主义国际都市社会中的道德意识与日常危机、台北作为后现代都市的空间面貌及其寓意。此文影响较大，是台湾电影和杨德昌研究经常引用的文献。另外，张英进的 *Screening China: Critical Interventions, 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辟专节论述杨德昌对台北的重新描绘，张将台北视作“全球本土性

城市”，指出其混杂与全球性杂烩特质。其他如裴开瑞(Chris Berry)、叶月瑜(Emilie Yueh-yu Yeh)、戴乐为(Darrell Davis)、洪国钧(Guo-Juin Hong)等人编/著的著作中都曾论及杨德昌，如 *Island on the Edge: 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 *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 *Taiwan Cinema: A Contested Nation on Screen* 等。

笔者看到的海外关于杨德昌的最新论述，是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2016年6月16日发表在其个人博客上的文章“*A Brighter Summer Day: Yang and His Gangs*”。在该文中，波德维尔简要概述了杨德昌的创作经历及每部作品的主旨与叙事特色，重点则是通过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部分镜头与段落的“拉片”式分析，阐述了该片的景别运用、场面调度与剪辑手法，指出此时的杨德昌受到了侯孝贤的启发并尝试了一些侯的拍摄方法。因为波德维尔的著作在中国有较大影响，此文一问世即受到杨德昌影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奇遇电影”和《电影世界》杂志都翻译转载了。

总体而言，在海外主要还是华人学者在研究杨德昌，贡献较大，而真正的西方学者对杨德昌的研究比较薄弱，一是数量不多，二是质量不高，普遍缺乏整体创作脉络观照、历史与现实语境的考察，论述有隔靴搔痒之感。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杨德昌“没有国际号召力”^⑩，在国际影展上不如同辈的华人导演如张艺谋、侯孝贤等人受欢迎^⑪。原因或许是，杨德昌西化的现代主义风格，如冷静的叙事，开放式结构，都市人际疏离的主题等，